

赵树理创作精神对新大众文艺的启示

李骏虎

前不久的一次社区读书会上，一位基层干部向我提问：为什么现在喜欢写作的人好像没有以前多了？我告诉他，不是写东西的人少了，而是创作方式变了。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直播、动漫、随手拍下的生活或者旅行片段，都是新大众文艺创作。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革命，更是让文艺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把创意随时转化为虚拟影像。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赵树理走上了大众文艺创作的道路，并进行了多方面颇为成功的实践。茅盾评价赵树理的小说：“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而当年赵树理的文艺实践就不仅仅局限于写作，他是个全才，写小说、编剧本、拉二胡、打快板、唱戏，被誉为“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可以说，赵树理作为大众文艺的探索者，与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从形式多样性上是一脉相承的。

赵树理的创作精神，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和“大众化”。他出身农民，了解农民，一辈子为农民写作。他不愿意做书斋作家、圈子作家，喜欢写老百姓爱看的通俗故事，拿到集市上摆地摊去卖。“人民性”和“大众化”，正是赵树理文艺创作的核心，这对于我们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人民性”和“大众化”

赵树理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终极追求，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来到北京，和老舍等文艺名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担任会刊《说说唱唱》的主编，这本曲艺刊物被确立为“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目的就是让识字的人群能看懂懂懂，不识字的人群能说能唱。翻开中国文学史，民间文艺需求与经典创作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哪一部没有大量吸收民间说唱文学的养料？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干脆直接用了评书的简明口头语言。赵树理的朴素初心，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他的作品故事主人公是老百姓，读者和听众也是老百姓，创作立场与人民大众彻底结合。赵树理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改善和精神需求，自述创作主张两句话：“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这里的政治作用指的是社会进步作用。1943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批评了旧社会包办婚姻的陈规陋习，在解放区推进了婚姻自由的新风气。作品既让老百姓拍手叫好，又推动了社会进步，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民主、婚姻自由的新面貌得到了国际认可。

新时代的伟大大实践，激发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带来了新大众文艺创作高潮。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繁荣发展更要秉承赵树理创作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人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葵花麦穗与田野》(中国言实出版社)，原名《葵花》。葵花是这部小说里的主角，一位女性人物。人物在小说里，大多有象征意义。葵花在这部小说里，以贤良淳厚的形象出现，有大地母亲的指向。这样说是小说写成后的感觉。在小说刚开始写或有写这部小说的念头时，葵花也只是是一个符号，单单是一名人。

小说创作是一次旅行，又是探险。说写作一部小说是旅行，是温和可人的说法。旅行，是令人向往的事情，你真不知道一路会遇见什么。探险却是自主的，是要严肃、认真地完成一件事情。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这两样不可或缺。少了悠闲的愉悦，小说是没意思的；少了探索精神，小说无意目标，失去力量和精神。由此，小说里作者带着人物，也是人物牵动作者，作者与人物相伴快乐而冒险地去远足。

葵花是一个好名字，清新爽朗。小说里葵花这个女人跟这个名字一样纯洁清明。她是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倔强的女人，九头牛拉不回来。这个好女人葵花，她是个做事的女人，不那么安分。在葵花这里，她的不安分是一种褒奖。因为她的不安分是要种地。不但她自己要种，还号召村里人种。

小说叙事正是乡村人日子好转的骨骨眼，人们徜徉在温暖的春光里。乡人们在充满希望和向往的同时，也有张望和懈怠。乡村的面貌一天天在发生改变，小工厂建起来，人们从每天下地劳动变成半农半工。这样的改变，让种地不再是乡村人唯一的指望。农业渐渐不被农民重视，庄稼地被撂荒，或者出让。

葵花就是这个时候有了思想。她对不把种地当回事愤愤不平。她不是要将自己标榜为一个“英雄”，只是因为对土地深深的热爱。葵花对土地的爱，是对传统的一种执着。这种执着不是守旧，而是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面对日新月异的生产表现出来的姿态。

葵花不仅要种地，还要丈夫田贵养猪。养猪不仅仅为赚钱，更多为了种地。发展经济以快速赚钱为目的，葵花买的是土猪苗，长得慢。她主张用麸皮、青草喂养。这样，小说有了矛盾和冲突。一个女人做事情是艰难的，想要带动全村人做事，其中的遭遇和艰辛，小说很有意思地一天天下写来。

这部小说创作处于我的创作欲极为旺盛时期。笔下太宽广，像车行草原，随性自由。这样的小说写作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如果让我重写，用词会更准确。但是，对于人物的塑造是鲜活的，特别是对人物的忠实描写，让读者可信，这一点我很自信。

关于小说语言，不夸张地讲，我的小说语言只属于我自己。似乎有一只手将这样的语言推到我面前：喏，你这样写！我在想，一名写作者的语言接近写作者的性格。有些东西，只能这样。

这部小说反映乡村振兴、农村土地、粮食安全问题，是新时期农村变革的社会现象。社会需要更多葵花式的人物，将热爱土地、热爱庄稼的火种大力传播下去。这部小说情节的可贵之处在于葵花种地和田贵养猪经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小说结尾达成和谐。这是一种理想式的表达，也怀抱希望，随着改革发展变化，贴近现实。

民性”和“大众化”。无论技术和平台如何发展，文艺创作的核心始终是人，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电视剧《人世间》和《主角》的热播，正是以普通大众为表现主体和作品主角的时代要求和社会反映。同时，创作者本人也应认识到自我也是人民大众之一员，永远不能脱离这种血肉联系，就像周扬在1946年《解放日报》评论赵树理所说：“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

“精品意识”和“时代担当”

有人可能会问：大众化、通俗化，会不会降低艺术的格调？会不会只能出一些快餐式的作品，而诞生不了经典？赵树理用他一生的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不单老百姓喜闻乐见，被转化为电影、戏曲、评书、连环画，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在海外有上百种译本。茅盾、郭沫若等老一辈艺术家给予高度评价，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反复阅读、研究、改编。2025年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太原举办，“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引发新的热潮。这就证明：为人民创作，不仅不会降低艺术品质，反而能锻造出真正有生命力、能传世的精品力作。

赵树理的精品意识体现在哪里？他常年吃住在乡下，与农民一起劳作，倾听群众心声，在老百姓当中寻找人物和故事。他善于运用评书、地方戏曲、快板等民间艺术形式，作品中满是生动鲜活的农民语言。他不是粗糙地“应付”大众，而是用最精湛的技艺去打磨老百姓看得懂的作品。他在《也算经验》中说：“要书写新的经验和生活，只能通过‘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来获得。”正是这种深入生活的扎实功夫，才让他的作品既有泥土气息，又有艺术高度。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现实关切，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社会推动力。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恰恰是这种“不想”的纯粹，反而让他站上了文坛的高峰。

“精品意识”与“时代担当”是相辅相成的，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科技强国、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重大主题也是亿万人民正在经历的火热生活。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生活环境的巨变，他们在基层的奋斗故事，都应该是新大众文艺关注和表现的主题，把镜头对准这些奋斗者，把笔触伸向这些新变化，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梦想挣扎、人性光辉，就能诞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赵树理的创作告诉我们：最光辉的形象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最伟大的作品往往生长在人民大众的土壤里。从《我的阿勒泰》到《给阿嬷的情书》，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因而成为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在近十余年的网络文学发展中，“医生文”的繁盛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在古典小说中，还是20世纪的通俗小说中，“医生”都很少作为主角出现，其职业成长线也极不清晰。我所能想到的例子，只有晚清时期儒林医隐的社会小说《医界镜》，这部小说取“镜鉴”之意，重心在揭露清末民初的医界乱象。2010年前后，网络文学领域开始出现一批以中医文化为主题的小说，包括柳下挥的《天才医生》、石章鱼的《医道官途》、叶天南的《超级医生》等，山西作家谢荣鹏（笔名银河九天）的《首席医官》也是其中之一。

《首席医官》(原名《首席御医》)于2011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总字数逾400万，后来由九州出版社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分别出版，共计13册。小说主人公曾毅父母双亡，自幼随祖父学医，大学也是读中医专业，虽然家境平平，但养就医者仁心与淡泊性情，更兼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大学毕业后，因为一次偶然机会，他得到赏识进入保健专家小组。曾毅以医道立身，但交游广阔，在行医过程中冷眼观世，心中常觉不平，于是投身仕途。他以医道窥世道，有“上医医国”的情怀，既未放弃对医术的钻研，亦能妥善处理工作上的困境，最后真正成为能够兼顾人情、业务与政治的“首席医官”。

《首席医官》基本上反映了网络文学中早期“医生文”的特点。首先，从小说的内容、风格看，作品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小说”与“世情小说”，人物及其经历只是引子，作者目的是借助这个引子融入自身的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与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比如曾毅以医术打开社交局面，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窥见种种人情隐曲、世态炎凉，这就与《医界镜》的写法颇为相近，只是《首席医官》所反映的不仅是“医界”，其篇幅大，视野自然更为宏阔，不仅涉及医生、企业家、各级官员，也涉及小摊贩、夜市歌手、门卫等，有较高的社会学价值。

其次，小说对“中医”的理解是从“文化”出发，而非

所谓的“善”，不是指无原则地说好话，而是一种理解力，一种对作家和作品的“同情之理解”。批评家要能悬置自己的偏见，进入另一个灵魂的光明与暗面之中，去理解写作者为何这样想、这样写。即使批判，也要让自己先做到充分的理解，进而出示一种严厉而温暖的力量。批评家要冷静，但非冷漠，没有“善”做底子，批评家的冷就真的冷了。批评不能让人读了心生寒意。

——谢有顺(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我对“代际”和“流派”这些概念比较迟钝。

“大众写”和“写大众”

赵树理生活的时代，创作主体主要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大众更多是“被服务”的对象。而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读者也是作者，大众既是创作者，也是受众。这正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新大众文艺的勃兴，首先体现在“素人写作”的活力空前。短视频平台每天有数百万条来自普通人的原创作品；网络文学站点日均新增投稿数以千计；社交媒体、音频社区让每个人都成为“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多的非职业创作者提起笔、举起手机记录生活，市井生活、柴米油盐里流淌出的文字和视频，扣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弦。这不就是赵树理当年做的事情吗？只不过从前是毛笔写在纸张上，如今是手指划在手机屏上；从前是在集市上摆地摊去卖，如今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工具变了，场域变了，但内里的精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把笔尖对准身边人的故事，一样的用自己听得懂、乡亲们也听得懂的语言来书写。

“大众写”意味着创作门槛的彻底打破，“写大众”意味着作品内容始终围绕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正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的标志。一个文化真正繁荣的时代，绝不是少数精英自娱自乐的时代，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都能参与创作、都能表达自我的时代。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已成为我国拉动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新三样”的原创力量，恰恰来自数以百万计的网络作家、短视频创作者、游戏策划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素人出身。

当然，“大众写”也带来了新的课题：流量逻辑深刻影响着创作选题，同质化、猎奇化、低俗化的问题不容忽视，出现历史虚无主义、过度娱乐、炫富拜金等“爽文”“爽剧”不良倾向；人工智能“一键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都便捷，也带来版权伦理等风险。这些挑战，赵树理当年没有遇到过，但他的态度早已给出了方向——用精品意识去引导，用健康审美去涵养，用专业力量去提升。我们要像赵树理当年主编《说说唱唱》那样，既尊重群众的创造热情，又提供专业的引导和平台。“大众写”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营造一个既自由又健康、既活跃又有品位的创作生态。

2026年是赵树理诞辰120周年，我们重读赵树理，不只是重温那些经典篇章，更重要的是获得有益启示。让新大众文艺创作能少一些对流量的焦虑，多一些对生活的深耕；少一些对圈子的迷恋，多一些对大众的亲近，让文艺的根系在人民沃土中扎得更深，让新大众文艺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这是我们对赵树理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从“技术”出发。这就意味着作者是将中医文化理解为一种“道”，而不仅仅是治病救人之术。曾毅的成功即在于他能够将中医之道化用于人际关系、仕途发展与行政工作。本质上看，《首席医官》对中医文化的理解集中在“阴阳调和”四个字上，小说中有个细节，曾毅去中医院讲课，虽怀抱异术，却只讲如何做“太平医”，他选择从一个个最常见的方剂“小柴胡汤”入手：“一个和字，就可以概括了这个方子，你可以将它理解为调和，也可以理解为平和，甚至拟人化一点，还可以理解为和事佬。人身上之诸般不和，都可以用这剂药来调和，包括阴阳不和、表里不和、情绪不和。”这是讲医术，也是讲处世。

最后，由于《首席医官》是从“中医文化”出发，以“祖传绝学”开局，并不另外借助“金手指”或“信息差”，所以明显区别于后来出现的“西医技术流”类型小说。从小说内容来看，其中专业性的因素并不算多，与后来的技术流医生文如《大医凌然》《手术直播间》《当医生开了外挂》等大不相同。这是早期“医生文”的普遍特点——如果顺着网络文学的发展脉络观察，我们还是会发现某种逐渐增强的“网感”，早期的网络小说总是与上世纪的通俗小说更为接近。

网络文学中“医生文”的繁盛大概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比如2010年前后以《首席医官》为代表的这批小说的出现，与2009年至2012年间的中医热、养生热密不可分。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此后几年间，中医文化得以迅速普及，若干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2018年以后，以《大医凌然》为代表的技术流“医生文”的大量涌现，则与网络文学平台对“现实题材”的大力扶持有关——对于许多网文作者而言，现实题材就意味着职业题材。总体上，我们可以将网络文学中的“医生文”分为“文化向”与“行业向”两个大类，而谢荣鹏的《首席医官》，无疑是文化向“医生文”的里程碑式作品。

我脑子里只有“好小说”和“坏小说”的分法。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能有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诞生。认知、情感、审美、语言能力、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金全勇先(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宋词三百首》早年间就读过，而今回过头来再读，更觉它气势恢宏、婉约柔美、深入浅出、哲理无穷。赏读宋词精华，无异于开启一次诗词之旅。

书中汇集宋代82位名家300首作品，以北宋第八位皇帝徽宗赵佶《宴山亭·北行见杏花》为开篇，李清照《赵遇乐·落日熔金》收尾，可以说是虎头豹尾。尤其李清照晚年这首伤今追昔之作，读来不禁让人为之动容，她借此词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全词用语极为平易，词人化俗为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大悲大痛，堪称词坛大手笔。

穿越大宋，正逢元宵佳节，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世界里，我在寻找一位“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满腔报国热忱的先生，奇怪的是这位先生赏灯不在“宝马雕车”，也不在“笑语盈盈”中。那人独立独行，远离热闹，久寻不着，原来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联系先生的遭遇，便可知道，这首《青玉案·元夕》的作者，有着“词中之龙”之称的辛弃疾，用的是对比和以宾衬主的手法，烘云托月地推出一位超俗的女子形象：孤高幽独、淡泊自持、自甘寂寞、不同流俗。这不正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吗？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虽命运多舛、备受排挤，但爱国信念始终未动摇，他把对国家兴亡的关切全部寄寓在自己的词作中。

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坎坷曲折，但却始终豁达乐观，不仅文章写得妙，书法、绘画也样样精通。接下来我必须拜访他。苏先生的经典诗词作品风格早已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篇词作以赤壁怀古为主题，将奔腾激荡的大江波涛、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千古而来的风流人物，酣畅淋漓地泼墨挥写于大笔之下。词中也流露出作者壮志未酬的感慨和人生如梦、岁月流逝的遗憾，但这种感慨和遗憾并非失望和颓废，而是向人们揭示出，千古风流人物虽然身名俱灭，但江山长在，江月长留，当举酒以酹。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面对挫折依然前行的气度；《江城子·夜记梦》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种真挚的夫妻感情描述，太催人泪下了。

此行我还拜访了一位婉约词人，此人名为晏殊。他5岁能作诗，7岁能写文章，乡邻们都叫他“神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词句，至今人们都在吟诵。此作原本是写深秋怀人离愁的词句，后来却被王国维先生借用来比喻治学的第一种境界。《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是晏殊的另一个名篇。黄昏时分，手握酒杯，听歌姬唱新词，感叹花开花落，秋去冬来，大为感伤，小径独自徘徊，惆怅心绪无法排遣。“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语言通俗却意蕴深远，给人以一种哲理性的启迪。

杨柳柳永，是我久已盼望之事。只因他是第一位对宋词全面革新的词人，词风婉约，词作甚丰。他本来出身官宦世家，想走仕途，却屡试不中。最出名的是他落榜后写了首《鹤冲天·黄金榜上》，里面名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到了直接批注“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相当于把他拉进了黑名单。柳永直到50岁左右才考中进士，但官职一直不高，最后以屯田员外郎致仕。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其实是自嘲，但这也让他把精力都放在了词的创作上。一首《雨霖铃·寒蝉凄切》是他的巅峰之作，里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被誉为古今俊句。

赏读宋词，有一位有着“词中李商隐”之称的雅士吴文英是不可不读的。虽然他《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但他一生以词著名，知音律，能自度曲。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著有《梦窗词集》，存词三百四十余首。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艺术技巧方面，以讲究字面、烹炼词句、措意深雅、守律精严为基本特征。吴文英在丰富词体方面，也有一定贡献。他的《唐多令·惜别》上阕：“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一个“愁”字，语带双关，写到极致。从词情看，这是说造成这些愁情的，是离人悲秋的缘故，秋思是平常的，说离人秋思方可称愁，单就这点说命意便有出奇制胜之处。从字面看，“愁”字由“秋心”二字拼合而成，所以此二字又近于字谜游戏，可谓绝妙。

若论气壮山河、光照日月之作，当数岳飞的《满江红·写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四个字，出人意料，让人拍案称奇。这十四个字略带咏叹，仿佛能看见将军抚胸梳理半生的悲苦心绪，一腔刚直的情怀，正显英雄多情本色。功名本是自己所期望的，怎会和尘土一样轻微；征战奔波何足言苦，还能伴着云月一同欣赏。看看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见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痛切话语，想让天下人体会。这沉痛的笔墨，字字掷地有声！

赏宋词之精华，正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无异于开启一场千年诗词之旅，大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之感。



现实与理想之间——《葵花麦穗与田野》创作谈

曹向荣